

姚著中国史·2

古代西北中国

姚大中 著

◎ 華夏出版社

姚著中国史·2

古代北西中國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著中国史·2, 古代北西中国 / 姚大中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1

ISBN 978 - 7 - 5080 - 8954 - 6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中国历史 - 上古史 - 研究 ②民族历史 - 研究 - 西北地区 - 古代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904 号

著作财产权人©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华夏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据三民书局 1992 年版排印。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财产权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14 - 6596 号

姚著中国史·2 古代北西中国

著 者 姚大中

责任编辑 潘 平 杜晓宇 李钊平 董秀娟 王 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3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定 价 70.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北方游牧势力的冲击

草原游牧社会与其独立文化的形成

游牧民族大跃动的历史意义	004
草原经济·游牧文化的特质	008
骑马·游牧民族的起源	010
北亚细亚青铜器时代与“胡人”	016
欧亚大陆游牧文化圈连锁	019
中国历史演进的双轨性	030

长城内外的对立

两个世界的分隔标志	034
长城的最初性格——国境线	035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042
游牧主动与其外向性	047
与耕地相斥的草原历史路线	051

匈奴—北亚细亚大风暴

匈奴雄长的世界意义与其汉族依附性	056
北亚细亚最早的统一	060
婚姻·军事·经济·精神生活	064
游牧封建与单于继承法	070
匈奴联盟中的汉人集团	077

战争与和平

巨大游牧压力下的汉朝和亲政策	082
由和到战十年间九次大远征	085
从漠南无王庭到匈奴降伏	092
和平波折与北匈奴西迁	099
南匈奴进入长城后的质变	105

东胡·西羌·前期突厥诸民族

四至六世纪间新汉族诞生与草原新形势	116
东胡·乌桓·鲜卑	119
从鲜卑游牧帝国到投入长城后的北魏	123
戎·羌·氐·月氏	130
后汉政治痼疾——西羌问题	135
草原“朝代”嬗代中的柔然	141
丁零·高车·铁勒·突厥	148

汉族中国以西的世界

| 认识古代“西方”

二千年前汉族世界眼光的扩大	156
贵霜一大月氏与嚙哒	164
中亚细亚古代历史的基本认识	173
中国史料与所指“西域”范围	177

| 新疆与河西走廊

沃洲地理橱窗与人种博览会	186
经济繁荣面下新疆政治的向上	192
新疆历史命运	196
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	199

| 从“通西域”到“西域经营”

中国西方事业起点的“凿空”	204
汉朝的新疆—中亚细亚征服	208
区域性共同防卫与都护统制体系	212
“三通三绝”的后汉西域支配	219
长史统治与高昌国成立意义	225

| 考古—古代学上的新疆

历史壮观复原与敦煌学	232
汉朝西长城制度	240
埋没沙中的鄯善王国	247
南北道古代史闭幕	258

| 东西方文化·商品交流的早期形态

中国对西方关系从混沌到开朗	272
外国通商·外国商人	275
世界性丝贸易与国际交通	282
古代世界东西大动脉——“丝道”	287
古代西方的“中国”认识	292
中国容纳外来文化的源泉与内容	298
中国文化传播西方	308

| 主要参考书

北方游牧势力的冲击

草原游牧社会与其独立文化的形成

| 游牧民族大跃动的历史意义

传统的中国历史记载，往往使地域范围固定在长城以南，历史的担当者也限汉族。对于长城以北，以及生活在那个区域内的人民，都不过附带述及，这与今日的“中国”意义，便不相当。单单长城以南，习惯上所谓中国本部，以及单单汉族活动，都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部。构成整部中国历史的空间，必须扩及贝加尔湖以南，以至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全部范围。固然，这些地与人，并非在历史所有阶段都是“中国”或“中国人”，但今日却是。

遗憾的是，这个方向的偏差很不容易纠正。直到今日，即使地理意识上也还留存“本部”与“边疆”的区别。这种区别，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最好尽量避免，十九世纪以来很多的痛苦回忆，实际便都因为外国阴谋家，夸大或强调了中国的地理区别观念，与故意制造中华民族间矛盾所致。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各部分与中华民族各组成分子无可分割，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面，便是汉族周围异民族因不断接触汉族而与汉族共同组合为中华民族，或者说，共同成为中国人。忽略或歪曲了这些，便无从谈正确的中国历史。

历史上汉族周围异民族接触汉族，北方尤其汇为主流，这种北方为主的情形，正如同古代欧洲历史。五世纪（中国南北朝时）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炫为文明的罗马人与北方“蛮族”间长期接触与冲突，等于中国汉族之与北方民族。中国北方关系对于中国，较之欧洲文明世界与蛮族，所不同的是结果。欧洲南下灭亡西罗马的北方诸蛮族，随近代民族国家兴起潮流而今日一个个分散与分别成为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与民族。中国则众所周知，北方民族先是一波一波南下投入汉族浪潮之中，终于举土地与人民，结合为中国与中国人的一部分。

中国北方，人与地的由与汉族中国相对立转变为立于中国之内，过程绵亘垂二千年。而其开始接触，则正与汉族以及汉族中国酝酿形成同时。

事实上，纪元前三世纪秦朝汉族大帝国诞生，虽有其自身必然性，北方这股新生力量的刺激，却直接提供为加速助力。同时，汉族也非先存在了民族意识，尔后成立这个民族，同样系因接触北方民族才激发民族自觉，这从汉族形成期早在春秋—战国之交，民族称谓却须北方民族极盛期，随“汉”这个朝代名称而铸定此一事实，便可了解。所以，中国北方民族的出现，对中国历史意义，非只仅仅扩大其意境领域而已，也表现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漠视的影响力。

中国长城以北，依广阔的戈壁大沙漠为界而分内、外蒙古，自然地理则通称蒙古高原或蒙古草原，与汉族环境的分际标志，正好便是一道自西而东，蜿蜒“万里”的大长城。其中内蒙古在民国时期，先后建置为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北五个省份。而无论地名如何随居民名称变易，这个区域，自汉族成立以来向为中国历史上非汉族的北方民族聚居之地，则无例外。要了解这些民族为什么会在汉族之外，长时期自成一个文化单元，须先明了其自然条件。

这个区域，地形高度大体在一千至二千公尺之间，因为距海遥远，各方面的潮湿空气都不易到达，所以干燥特甚，大陆性格非常强，多数地区都少雨。全年雨量平均二百公厘以下，戈壁沙漠中尤其年雨量落到五十公厘以下。北部虽因微受北极气候影响而雨量较多，但也不过二百公厘左右。气温变化也剧，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温度差距经常超过摄氏四十度。库伦（即乌兰巴托，今蒙古国首都）算是蒙古气候最适宜地区之一，年雨量也特殊能到达二百四十公厘之谱，但是，月平均温度的差幅，正月仍在零下三十三·七度，而七月份则十七·一度，每年有六个月以上的气温都低于零度。因此，蒙古大草原的内陆干燥性格，与汉族标准聚居地的海洋性湿润季节风地带，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一个观念上的认识对历史了解也属重要，便是蒙古（或其前代地名）范围古今不同。今日蒙古，北方以恰克图为尽头，古代却须再往北包括了西伯利亚南部森林边缘的黑龙江上流额尔古纳河（Argun'）以西，贝

加尔湖（Lake Baykal）周围。这个部分，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时才被分割，而并入了帝俄暨今日苏联领土。但当地居民，迄今仍无可隐蔽的为蒙古人，一类人种、宗教信仰都与外蒙古无异的布里雅特蒙古人。这个地区，今日除直接并入苏俄（Rossiiskaya SFSR）的东半部外，西半部建立为苏联的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Buryatskaya ASR）。非仅贝加尔湖一带是蒙古，叶尼塞（Yenisey）河河源地方也是。这萨彦岭（Sayanskii Khrebet），唐努乌拉山（Khrebet Tannu - Ola）中间地的山岳地带唐努乌梁海，尤须迟至民国成立，始自外蒙古切离而变更政治原状，先则成为苏联的土文自治共和国（Tuvinskaya ASSR），以后又并入苏俄为一自治州（Tuvinskaya Avtonomnaya Oblast），这是指现在蒙古的北方。关于其东与其西，同样已被收缩，收缩时期同样是在清朝。确定以蒙古与汉族中国结合，是清朝值得特笔大书的历史贡献，但是，当时蒙古这大片土地并非整体而是分成几个部分与几个阶段，陆续加入中国的，因此，也于同时由清朝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处分。蒙古本无所谓“内”“外”，便因这个原因才依南、北方位而区别。东面呼伦贝尔则划归黑龙江将军（今日是兴安省的西部），西面准噶尔盆地又改入新疆。

呼伦贝尔介于兴安岭山地与现在蒙古之间，地形本身便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毫无自然标志足资区划，如须区划，应该便是再往东的兴安岭。

准噶尔盆地虽有阿尔泰山蔽障其东北，却是主峰也不过海拔四千公尺，山脉南端且开了个大缺口得以畅通蒙古高原，从海拔五百公尺的盆地中心南北扩散，其边缘迪化、镇西一线，地势都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所以，准噶尔盆地的地理特征全同于内、外蒙古，年雨量约二三百公厘，草地丰茂而东西连成一片，也是全年有五个月气温都在零度以下，迪化正月零下十九·三度，七月二十三·九度。并且，从雨量较多而气温差度较小的角度看，条件反而较蒙古高原为佳。这个盆地以西，自斋桑泊（Zaysan Nor）周围，沿巴勒喀什湖（Lake Balkhash）南口直线往南，包括伊什克库湖（Issyk Kul）在内，以抵帕米尔高原的全域，也于十九世纪后半被清朝承认割属沙皇俄国，今为苏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R. S. F. S. R.）阿尔泰区内的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Gorno - Altay

A. O.) 以及哈萨克共和国 (Kazakhskaya SSR)、吉尔吉斯共和国 (Kirgizskaya SSR) 与塔吉克共和国 (Tadzhikskaya SSR) 的领土。

所以，今日地图上所见的蒙古，只是政治区域而非地理区域，也唯其如此，今日所见的蒙古，并非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唯一聚居之地。中国历史上所指北方民族的活动范围，如依清朝初年蒙古人天地为标准，大约在北纬三十七度到五十七度，东经七十五度到一百二十二度之间，亦即东起嫩江流域，西及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南至长城，北连叶尼塞河上流域与贝加尔湖周围的地域。简单地说，北亚细亚大草原整体。

汉族关于北亚细亚民族的记载，开始于纪元前五世纪末以后的战国时代。在那时，已经很明显能看到一个较之汉族自身完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在中国北方迅速兴起。其特征，一是游牧，一是骑马。以后，中国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都曾以郑重的态度说明如何发现这一件大事。事情的严重性，尤其表现在这批人会“骑”到马背上，以及配合骑术而出现机动与快速的新战术、极其锐利的攻势，这是汉族从未见识过的人与事。汉族中国环境内，传统的战争方式非“车”即“步”，对马的经验，从来也不过用以载物或驾车，尽管驾车时可以从一匹马发展到几匹马，却从未想到人可以跨在正奔驰中马匹背上的可能性。而现在，从外面突然而至的人，却实实在在是“骑”了马来。农耕人民的生存，因此立刻受到措手不及的威胁。于是，这一群与众不同的人，被自身也才刚刚成立的汉族，称之为“胡”，一个前所未有的名词。

“胡”这个名词被采用是应当引起注意的。当汉族形成之前，前期汉族诸农耕集团与范畴以外其他人民间，只有政治上部族或“国”的区分，而无所谓民族之别。汉族形成之初，又放眼全是同族，“民族”这一类意识，向来不曾、也无由产生，必须待到骑马人从北方出现，向无民族意识经验的汉人才愕然发觉，“天下”除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之外，原来还同时存在一种足与自己相抗衡的另一类型文化。代表这类新文化的人，从而也不得不被汉人承认有与自己相对立与相平等的地位——汉人，是我；胡人，是另一个人类集团，亦即异民族。民族间的差异认识，至是开始建立。并且，也连带因

此转变了固有的“戎”、“狄”观念，由政治集团称谓一并赋予民族意义。凡在北方或西方出现的任何异民族，区分可为“北狄”或“西戎”，泛称则一律是“胡”。

| 草原经济·游牧文化的特质

胡人，活跃天地在中国北方可耕地范畴以外的北亚细亚大草原。这个社会，这些依牲畜为生计的骑马人，在大平原上农业社会的汉人眼中，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另一个世界与汉人生活迥异到什么程度？以下都是：

第一，草原经济的基本是牲畜，牲畜不但可以供给作为主食的肉食，乳供为饮料或制成乳酪，同时，毛、皮还可以利用来制成衣服御寒，加工后的毛毡可以盖搭帐篷居住，甚至粪便，冬天也可以用作燃料驱除寒气。马与骆驼，则交通运输方面的效用尤大。马乳虽薄，但有独得的酸味，也为一般人所爱饮。所以，在草原天地中，虽然谷食较之肉食仍属同等重要，但当必要时，无论衣、食、住、行，却概可从放牧的牲畜身上求得解决，此与农业社会可以专赖素食正相反。同时，货币对于这个社会，可谓毫无功能，对外固有其团体性贸易，但方式概为物物交易。本身社会内部，并无交易需要，彼此都自给自足，对外交易所得物资，注重的则是分配。在游牧社会中，牲畜便是财产，财产标准也全视牲畜而定。尤其是羊，愈多，愈可以自给自足，也愈表示其富足。这种情形，与农业定居社会以庄稼收获为财富标准的观念与实质，实际并无根本意义上的不同，却也便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区别所在。

第二，与农业社会的固定性格恰恰相反，游牧社会特别重视移动。农业社会中，人必须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草原却不然。为了避免一年中特有的严寒与酷暑，牲畜必须有冬、夏两季不同的牧地，人也必须随之在夏季牧地与冬季牧地之间移动，而有冬、夏不同的帐幕驻扎地，每年循环度其游牧生活。更重

要的，牲畜完全依赖天然放牧，但没有一片草地经得起长时期利用，这又是所以必须移动的原因。较远的距离，可以移动到数百里以外，甚至更远（猪在游牧社会中所以没有地位，便因为它们与容易移动的原则违背）。土地所有权观念，在草原上因此并不重要，草原人民的生存律在“土地分配+移动”，土地分配而且便以移动为前提。自由移动，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基本权利，如同定居社会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所居住地方，也便是随时可搭、可卸、可迁移的帐篷，或者，用马驾的车辆。

第三，对马匹的重视。草原游牧社会离不开马，也以马，以及使奔驰的马得控制在人手中的骑术为生存条件。否则，大群牲畜成功地放出去与赶回来，以及长距离间的迅速移动，都无法实现。所以，在游牧世界中，只有马与骑术的功能，才能达成草原—牲畜—人之间的联系关系。骑术在农业社会中为未受专门训练者所难做到，游牧世界却是无分男女老幼的基本技术。

第四，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游牧社会因此也与农业社会相异。他们社会结合的纽带是血缘的，构造是阶级性的，性格是保守的。个人自由以社会安定为前提，指导权握在少数上层阶级人物手中。团结、机动与领导，又是其机能特色。大群牲畜的放牧，不可能仅由一、二个人负责，依靠的是团体行动。基于草地分配与移动的需要，大团体又必须服从领导，以及机动散、合。所以，草原社会形态，必然成为金字塔式，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血缘团体的氏族，若干氏族合而为部族，若干部族又相互结合在某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与某一个强有力的氏族领导之下，而形成“国家”整体。生产体系亦同，氏族与其附属的奴隶群，是每一个管理与繁殖所属牲畜的单位。因此，视为财富的牲畜，在游牧社会中，不属于私人而归团体共有。也惟其如此，游牧社会只有团体的富足或贫乏之分，而非个人。但是，游牧社会尽管阶级化，其社会的阶级性格却微弱，成员在原则上有其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指导者原则上须经过选举而产生。

第五，草原人民，其各个团体间彼此为了保护牲畜，为了牧地使用与分配的争执，或者，排解移动进行时的阻力，再或者，共同联合防止外人侵袭，战争都随时可能发生，也随时须要防备。所以，游牧生活可说永远便是战斗生

活，团体组织与严密的军事组织成为二而一的不可分形态，各团体随时随地是个保持防御与攻击双重戒备的集团。在团体中，任何成员，从幼年便在生活中接受战斗训练，与习惯于突发的战争，男女几乎没有多大分别。草原人民，无论白天或黑暗，风吹草动立即警觉，一声令下，不作有计划的迅速前进，便是有秩序的迅速撤退。这些，完全表现为一种“力”的精神，与农业人民和平相处，所谓“止戈为武”的原则，恰恰相反，先天的战斗性为其民族特质。

第六，草原人民忍受干燥沙漠地带的严寒与酷暑，生活资源仰仗牲畜，牲畜又须不断迁移，所以，他们的生活是质朴的，与农业社会人民过惯的城市生活，全不相符。伦理与法律规范，因此也不能以农业社会的标准衡量，农业汉族道德律不适用于草原社会。草原人民保护他们的游牧财富，思想境地非常单纯，对友忠诚，对敌残酷，只求团体生存而无视个人生命。作战时英勇无畏，以牺牲小我为光荣。这种精神，私有财产制的定居社会人民不容易领略。同时，即使非逢变故而在平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繁衍也大有阻力，为维系并绵延这个强有力的团体，他们必须重壮年、轻老弱，而且产生父、兄亡故而子、弟“妻后母，配寡嫂”等等现象。这些现象，到了农业社会的汉人眼中，都成为禽兽行为。

如上这些，都是游牧社会区别农耕社会最显著的特质，而汉人引以为奇的。也唯其游牧世界有如许特质，才能在农业文化之外，自行建立起一条独立发展的路线。当然，所谓游牧文化特质，并非绝对，与农业世界相较，正确说来，只是偏重而已。

| 骑马·游牧民族的起源

游牧文化如何形成？游牧民族何时形成？是历史解明上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游牧”可谓最晚成立。人类超越获得经济范畴